

海上絲綢之路與閩方言

李如龍

廈門大學

提要

閩方言在南洋的分佈是華人開闢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南洋閩方言的變異體現了閩人對母語的忠誠和語言接觸中的深度交流，南洋閩人的語言生活反映了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的可貴品格。

關鍵詞

海上絲綢之路，中華文化，閩方言，南洋閩人，和而不同

1. 閩方言在南洋的分佈是華人開闢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

經海上絲綢之路外銷的商品最早成規模的是瓷器和茶葉。福建早在宋元時代就因盛產瓷器和茶葉而富有盛名。北宋名臣仙遊人蔡襄任福建轉運使時，曾在建州督造過建瓷和建茶，著有《茶錄》。他的詩中的名句“兔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寫的就是用閩瓷煮“北苑茶焙”的情景。後來興起的泉州港的對外貿易，為這兩樣商品的外銷提供了方便。“兔毫”是閩北建陽、崇安、松溪一帶的“建窯”出品名瓷，有黑色的“黑釉”和紅色的“紫甌”。“龍鳳團茶”則是建州的“鬥茶”習俗錘煉出來的向宮廷進貢的名茶。後來，在閩南德化、平和一帶出產的“青花瓷、白瓷”和安溪培育的“鐵觀音”，也都是馳名中外的上品。這兩大宗商品運到歐洲之後，成了宮廷裡豪華陳列，也是肉食者日不可少的飲品。於是，他們知道了，china（瓷器）產於China（中國），卻未必知道tea（茶葉）的讀音就是來自閩語的方音[te、ta]。數百年後在東南亞和印度洋的海底先後撈起的碎瓷片，大多證明是閩瓷的質地；英語裡的“oolong、bohea、gongou”便是閩茶名稱“烏龍、武夷、工夫”的音譯（李如龍1997: 143-144）。

海上絲綢之路早在1600年前就開通了。東晉和尚法顯399年離開長安，413年就是從印度、錫蘭、由海路經孟加拉、印尼回到建康的。300年後大唐的義淨和尚則是往返都走南海、印度洋的路。自從南宋在廣州和泉州先後設立市舶司之後，這暢通的“海絲”為中外的貿易作出了很大貢獻。據《元史》所載，當年泉州港就統有海舶15000艘。《馬可波羅遊記》則稱刺桐（泉州）港為世界大港，“商人雲集，貨物堆

積如山，難以想像”。到了 14 世紀的明朝，鄭和 28 年之中 7 次下西洋，多從福建的長樂出發，200 多艘海舶裝著 2700 名人員和批量的瓷器、茶葉，從南海穿過馬六甲海峽，經印度洋直到東非，可謂聲勢浩大。那以後，不少史籍都有閩人留居南洋的記載。如：元代南昌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說，單馬錫（即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國人居之”。勾欄山（加里曼丹）有“病卒百餘人”滯留當地，“今唐人與番人叢雜而居”。馬魯澗（伊朗馬臘格）“有酋長，元臨漳人，陳其姓也”。鄭和隨員、漳州人張燮的《東西洋考》說到菲律賓：“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為壓冬，聚居澗內為生活，漸至數萬。”說到汶萊：“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馬歡《瀛涯勝覽》說：“嘉靖間，漳泉及潮州人，多至滿刺加、勃泥、暹羅。”鞏珍《西洋番國志·爪哇國》則稱：“杜板……約千餘家，中國廣東及漳州人多逃居於此。”《明史·外國傳》也有些記載：“嘉靖末，廣東大盜張璉作亂，官兵已報克獲。萬曆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璉列肆為蕃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列傳第 212）除了行商滯留、造反逃亡，更多的是閩地生活無著而出洋謀生。如惠安人謝履所云：“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辟，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清初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則在引閩諺“海者，閩人之田”後說：“泉漳二郡商民，販東西二洋，代農賈之利，比比然也。”（李如龍 1997: 94-98，有關史料可參閱陳家榮 1987）

閩人移居南洋是長時期積累的，大批量出洋應該是明清之後，基本方式是鄰里鄉親投親靠友，陸續按姓氏、鄉籍聚居。因而形成了按照方言區分的“幫”。屬於閩方言的就有“福建幫（即說閩南話的群落）、潮州幫、福州幫、興化幫（說莆仙話的）、海南幫”。在人地生疏的異邦，按籍貫、姓氏和方言聚居的群體形成了穩定的社區，社區之內，又按祖籍設立“會館”，按姓氏建立“宗親會”，按行業組織“同業公會”，把先來的“新客”和後到的“舊客”團結起來，共同參與各種民俗活動：拜年、掃墓、祭祖、過端午、中秋，以及敬神拜佛。所崇拜的神祇有天公、觀音、媽祖、關帝、三寶公、大伯公（土地神），鄰里間的婚喪喜慶活動皆一仍其舊，生活和事業上則互相幫襯。這樣的社會生活不但使大家的生存和發展得到基本保證，也鞏固了族群和鄉土的意識，所使用方言成了與祖居地閩語多少有別的大大小的方言島。

早期到東南亞去的華人主要是東南沿海閩、粵、客三個方言區的人，其中說閩語（包括福建的多種閩語和與閩南話相近的潮州話、海南話）佔著顯然的多數。各種方言的人數，以往曾有過許多具體的統計，但都難以精確，以下提供一些數字供參考。

楊力、葉小敦（1993）的《東南亞的福建人》報導了 1955 年北京華僑問題研究會統計的東南亞地區華僑人數是 1160 萬，福建省的華僑人數是 365.8 萬，佔全國在東南亞華人總數的 31% 以上。其中菲律賓閩僑佔 82%，印尼、緬甸、新加坡都佔 50%（楊力、葉小敦 1993: 40）。

另據馬來西亞 1980 年華人人口及所屬“方言幫”的統計，屬於閩語幫的有 2008975 人，佔華人總人口 54.48%（楊力、葉小敦 1993: 137）。據新加坡 1970 年統計，閩語各幫 120 萬人，僅福建幫就佔 74%，其他幫 37.9 萬人（楊力、葉小敦 1993: 219）。菲律賓華人據“菲華商聯總”1973 年統計約有 60 萬，85% 是說泉州腔的閩南話（楊力、葉小敦 1993: 316）。又據陳烈甫，泰國華人 230 萬，其中潮州幫佔 56%，加上福建幫 7%，說閩方言的佔 63%。馬來西亞華人 170 萬，福建幫 88.8 萬，佔近 50%。¹ 可見，綜合起來看，說閩南話的“福建幫”在東南亞華人中可能佔有近三分之二的比例。正因為如此，在華語普及之前，閩語中的大支——閩南話實際上成了東南亞華人之間的通語。

從這一點上說，閩方言、尤其是閩南話曾經在東南亞有廣泛分佈，正是閩人、閩南人作為開闢海上絲綢之路的主力的有力證明。

後來，上世紀 50 年代，用粵語對白的香港電影在東南亞普及之後，加上粵人善於商場運作，粵語擴大了使用範圍；東南亞各國的華文學校則大多採取華語教學，加上新加坡 50 年代發起了推廣華語的運動，如今華語已經在東南亞華人中取代閩南話成為華人之間的主要通語了。

2. 南洋閩方言的變異體現了閩人的母語忠誠和語言接觸中的交流

方言和任何語言一樣，只要還存活著，就會發生變異。南洋的閩方言在幾百年間發生了哪些變異呢？下文分兩方面來說。

一方面是母語傳承中的變異。

閩南人把母語帶到東南亞，因為是大體按照同鄉和方言幫聚居的，周邊所通行的原住民語言又都是差別很大的不同語系的南島語和南亞語，在那和原鄉相距萬里、遠隔重洋的異國，依然能夠使用自己所熟悉的鄉音，人們就會油然而生一種興奮，從而保持著對於母語的忠誠。近些年來我和我的團隊調查過菲律賓（馬尼拉）、馬來西亞（檳城）、和泰國（曼谷）、印尼（棉蘭）幾處閩南話，就感受到那裡還說著的閩南話和原鄉的話並沒有太多差別，不但通話無阻，還可以辨別出是泉州口音、潮州口音或漳州口音。我自己到過檳城、雅加達和馬尼拉，和那裡的中老年人交談都沒有發生障礙。所發現的變異只有如下幾點：

語音方面主要是一些音類的合併和文白異讀的精簡。

¹ 陳烈甫：《東南亞的華人華僑與華裔》。轉引自林再復 1991: 453-459。

1995年，高然調查了從印尼蘇門答臘北部亞齊省來的老歸僑陳先生說的“福建話”。定居在那裡的閩南人有數十萬，是漳州和泉州的移民，傳承了幾代人了，亞齊的閩南話只是把漳、泉口音作了一番整合：聲母系統保留了漳州音的 dz 聲母；聲調系統是調值近泉州音（陰平為 33 調，陰入 5、陽入 23），調類則近於漳州音（陰陽去分調，濁上併入濁去）；而二音節連讀變調，則與泉州音相仿：前字陰平、陰入不變，陽平、陽去和陽入變得十分相近。就韻母的類別說，凡泉漳廈有別的，多選用更普遍的讀音，總的說，接近漳州音的多些。漳泉廈有別的，取漳州音，例如 ue：皮、過（泉 ə、廈 e），əm：森、參（泉 əm、廈 əŋ），ueʔ：月、襪（泉、廈 e），uan：縣、懸（高）（泉、廈 uĩ）；若泉廈同音、漳州特異的則不取，例如，e：爬、家（漳 ε），iũ：羊、張（漳 iõ），若漳廈同、泉州特異的也不取，例如，iŋ：燈、能（泉 əŋ），有些音泉廈同，漳州有別的也取，例如，eʔ：八、節（泉、廈 ue），uĩ：酸、卵（泉、廈 ŋ）。不過，也有兩讀並存的，如：飯、碗，讀 ŋ、uĩ（高然 2000）。

新世紀初年，莊初升和張雙慶兩位先生按“大閩語計畫”調查的馬尼拉閩南話是接近晉江話的泉州音。和原鄉最大的不同是字音文白讀的殘缺。閩南話單字音有文白異讀的超過半數，傳到域外後，因為一般只用於口頭交際，口語不用的讀書音就被大量淘汰了，例如所調查的“果、假”兩攝的 65 個字，保留文白讀的只有 25 字：我簸破磨（平）螺果過和把馬渣沙加價架嫁下廈夏斜也瓜瓦花；其餘的 40 字有放棄文讀的：做搓柯鵝坐火爬耙茶紗家假蝦蛇，也有因口語詞不常用而放棄白讀的：可（小可）、何（無奈何）、課（功課）。

即使是一百多年前的通行於泰國的潮州話，和現代粵東的潮州話，語音之間也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和李竹青 1994 年曾發表過《潮州方言語音的演變》一文指出，1883 年在曼谷出版的《漢英潮州方言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Goddard 1883）和現代潮州話的差異，主要也就是少了一套 -n 和 -t 韻尾的十幾個韻（李竹青、李如龍 1994）。60 多年前美國漢學家包擬古（Bodman 1955）在吉隆坡調查並整理出版的《福建廈門話口語》（*Spoken Amoy Hokkien*）和現在的廈門話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詞彙語法方面，由於漢語的語法與眾不同，不容易接受別的語言的影響，語法規則比較穩定。詞彙的變異則分成內圈和外圈，內圈是穩定的核心詞、方言特徵詞和基本詞彙，這是不容易發生變異的；外圈是一般詞彙，為了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經常要增加新的成分、也揚棄新時代和新地方所不需要的舊成分，所以變異比較快。閩語的許多核心詞是上古時代傳下來的，已經成為詞根，構成了大量的詞彙，如粟（稻穀）、儂（人）、囡（兒子）、冊（書）、鼎（鍋）、厝（房子）、骹（腳）、衫（上衣）、箬（葉子）、翼（翅膀）、糜（粥）、食（吃）、箸（筷子）、卵（蛋）、漂（浮萍）、沃（澆）、曝（曬）、拭（擦）、縛（綁）、倚（站）、囡（藏）、徙（移

動)、飼(餵養)、芳(香)、晏(遲)、懸(高)、驚(怕)、細(小)、幼(細小)、瀨(涼)。這類常用詞不論傳到多遠,都是不會遺失的。那些區內普遍通行、外區少見的特徵詞,因為常用,也不容易丟失,例如:生理(生意)、頭家(老闆)、起火(生火)、紙字(鈔票)、翁姆(夫妻)、深井(天井)、俗(便宜)、手指(戒指)、算數(算帳)、清氣(乾淨)。至於一般詞彙,在閩南話的本土,同樣的意思本來就有不同說法,這樣的詞彙在域外的閩南話中,因為有不同地方來的人,各自帶來了自己的說法,也有些是從客家話或廣府話借用的,還有的是到了新地後另造的。這就很容易造成並存並用的同義詞。這種情形在閩粵本土的閩南話中也有,但是比較少見。例如:茶葉——茶心、茶箬、茶米,馬鈴薯——番仔薯、乾冬薯、荷蘭薯,花生——落花生、塗豆、地豆,白天——日時、日間、日頭、白日,晚上——暗暝、暝時、暝昏、暝昏頭,後來——路尾、慢後、尾手、後日,以前——舊底、舊時、往過、往擺、先時,熱水瓶——電瓶、電罐、熱水壺,茶壺——茶鼓、茶罐、茶瓶,洋蔥——霸蔥、北蔥、番蔥、大粒蔥,煤油——塗油、火油、番仔油、臭油,汽油——電油、車油、樹奶油,手電筒——手電筒、電火、電筒,癩腿——癩骹、擺骹、拐骹,下飯菜——物配、鹹、菜配,水泥——霸灰、霸塗、紅毛灰、洋灰,包粽子——縛粽、包粽、裹粽、拍粽,收工——放工、散工、歇工,農曆——唐農曆、咱農曆、舊曆、老曆,洋樓——番仔樓、紅毛樓、獨立厝,早米——春米、六月米、早幫米,晚米——晏米、十月米、下幫米、晚季米。

此外,在南洋安家,自然環境及社會狀況和故土多有不同,遇到方言母語無法表達的意思,往往就會借用當地語言的一些詞彙。一百多年前在新加坡出版的《華夷通語》(林衡南 光緒9年[1883]),共收馬來語的常用詞語和短句2800多條,其中有的當時就被閩南話借用,並陸續傳到閩南本土。例如 *kawin*(交寅:結婚), *mati*(馬滴:死), *kapas*(加貝:棉花樹、棉織品), *sabun*(雪文:肥皂), *tongkat*(洞葛:文明杖), *suka*(須甲:中意,喜愛), *kawan*(交彎:朋友), *buaya*(魷仔:鱷魚), *bali*(峇厘:船艙), *macam*(馬占:人物)。有的閩南人已經不知道這是馬來語借詞了(李如龍 2000b)。筆者以前曾經搜集過一批閩南話的馬來語借詞和馬來語裡的閩南話借詞。前者如: *kopi*(咖啡), *kakao*(可哥), *karicare*(咖喱), *capio*(有沿的攏帽), *sabun*(肥皂), *ayan*(洋鐵皮), *sago*(西谷米), *mangga*(芒果), *durian*(榴蓮), *pinang*(檳榔), *sate*(沙茶), *baba*(峇峇:華人和當地妻子所生的混血兒), *lacur*(落仄:丟醜), *sarong*(沙龍,馬來人的裙子)。有時這種馬來語的借詞也並非“填補空擋”,甚至是常用詞,也可以借來並用的。例如: *patut*(巴突:規矩,道理), *capcae*(雜菜:可用於引申義“混雜貌”), *gudang*(牛籠:倉庫), *kaya*(加額:富裕)(李如龍 1998)。

世紀之交陳曉錦到馬來西亞向那裡的華人調查了潮州話、客家話和廣府話,2003年出版了《馬來西亞的三個華語方言》,她設計的調查詞表包括2437個常用詞,經過

調查，潮州話裡就有馬來語借詞 98 個，英語借詞 130 個，228 個外來詞將近佔了調查條目的十分之一（陳曉錦 2003）。

另一方面是語言接觸中的深度交流。

東南亞華人雖然是按方言聚居的，為了生存，就要和當地土著打交道，像第一代華人那樣，只懂得方言母語，在那裡是很難生存的。事實上很多未帶家眷的男人就和當地婦女婚配。時間長了就慢慢學會了當地語言，混血所生的“峇峇”更是從母親那裡把本地的馬來話學得更好。幾百年過去了，如今東南亞的華人大多已是第三、四代的華人了。二戰結束後，東南亞殖民地先後獨立建國，在義務教育中推行自己的民族語言，學校的外國語也是首選英語，年輕的華人學得更好的是國語和英語，進華文學校的兼學華語（漢語普通話），於是，漢語方言的母語逐漸退縮到華人家庭和華人小社區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人口比較集中的社區和有華文學校的地方，華人青年還能聽說一些方言，交往廣的甚至還能兼通國語、華語、英語和一兩種或兩三種漢語方言，這類多語者是普遍存在的。本人在暨南大學任教時，曾經在該校的馬來西亞留學生中做過調查，並請他們把問卷帶回他們的家鄉（柔佛州）做調查，回收的問卷雖然不太多，卻很能說明問題。說閩南話的父輩 33 人中兼通華語、國語和閩粵客等方言三種的有 12 人，兼通四種的 13 人，兼通五種的 5 人；那裡的青年大學生大多懂三四種話。64 個樣本中，第一語言為華語、第二語言為國語的 28 人，第一語言為華語、第二語言為方言母語的 33 人，第三、四語言為其他方言的 9 人，第二語言為英語的 12 人，第三、四語言為英語的 30 人。關於學習多語的動機，他們的回答是：因需要而學國語的 81 人，學英語的 74 人，學華語的 52 人，學方言的 48 人。關於對多語制的評價，93 份答卷中，認為對個人謀生和社會交往必要、有利的 87 人，對民族團結和國家發展必要和有利的也是 87 人，認為對個人智力發展有利的 67 人。馬來西亞華人青年中的普遍存在的多語、多方言的現象成了當地華人社會的一條有趣的風景線（李如龍 2000a）。

生活在東南亞的幾千萬華人，因為所處的國家和地區不同，境遇的差別很大。不同國家的經濟、政治情況不同，語言文化政策不同，華人人數多少、實力強弱、是否聚居也不一樣，所以不同國家的華人的語言生活和多語環境也各不相同。在菲律賓、泰國和馬來西亞，華人多集中聚居，中老年人多能掌握華語和方言母語，兼通當地國語，文化高的也懂英語。新加坡華人最多，但由於政府推行英語、削弱華文教育，中青年大多已經放棄方言母語，雖有推廣華語的號召，因為脫離政界和學校的應用，效果卻很有限。在印尼，華人多達 600 萬，但只佔總人口的 2%，人口最多的福建幫較為集中地在巴達維亞、泗水等爪哇商業城市從事貿易，閩南話和印尼語之間都有大量借詞，提供了華人與印尼人交際的方便，形成了“華人馬來語”。由於政府在 1966 年之後的近半個世紀裡，採取了嚴厲的民族同化政策，取締華文教育，禁止華文書報入

口，連華人固有的漢語姓名也不准使用，原本已經相當普及的華語和民間一直堅挺的方言，遭到嚴重的摧殘，逐漸式微了。除了土生華人早已同化于印尼語之外，新客和青年華人同當地人交往時所用，只能是從學校學來的相當規範的印尼語，只在和老年華人交往時混雜些漢語方言詞彙，完整的方言就說不來了。

不過，從總體上說，大多數東南亞華人目前的狀況還是存在著普遍的雙語和多語的現象的。家裡、族內交往用華語和漢語方言，學校和社會上用當地國語及其方言，文化高的還會英語。這是多種語言共存並用的接觸中深度交流的結果。

另一種語言接觸的深度交流是漢語方言和馬來語的雙向借詞。印尼語和馬來語本來是相近的語言，使用人口有三億。由於最早到南洋去的大多是閩南人，不論是印尼語或馬來語，都有數量不少的閩南話借詞。這早已引起學者的注意，不少人對此做過研究。筆者在上世紀 90 年代曾經搜集過近 300 條，閩南話向馬來語借用的也有近百條。最有趣的是還有馬、閩互借的雙向借詞。例如：

duit (鐻) —— ci (錢)	makan (馬幹) —— ciak (食)
cilaka (遭殃) —— cialat (食力)	suap (侵吞) —— ciak (食)
patut (規矩、公道) —— cengli (情理)	mana (為什麼) —— 按怎

一般的外來詞都是單義項的，也不能派生構詞，而在閩南話和印尼語之間這種情況都不少見。例如：

印尼語的閩南話借詞：

漆——cat, cat minyak (油漆), tukang cat (漆匠), mengecat (上漆), catbakar (噴漆), 餠——kue (糕點), kue kue (多色糕點), toko kue (糕餅店), kue basah (蒸的糕), kue kering (烘烤的糕點)

閩南話的印尼語借詞：

sabun (雪文：肥皂), 雪文水 (肥皂水), 雪文盒 (肥皂盒), 芳雪文 (香皂), 臭雪文 (藥皂), tongkat —— 洞葛 (手杖), 洞葛頭 (手杖把), 番仔洞葛 (不明事理的人), 洞葛恰濟烏銃 (諷諭“官比兵多”)。(李如龍 1998)

在漢語的本土，方言是從屬於普通話的，普通話的詞彙語法很容易被方言接受，方言詞和方言語法卻很難被普通話吸收。而在東南亞華人社會中，因為早期通行的是方言，數以千萬的人又多半是聚居的，因此當他們初學華語的時候，就會把一些常用的方言詞帶進華語，並讀成華語的音。有些方言的構詞法和在句法也會套用與華語。

長期在新加坡辦報的華人學者汪惠迪（1999）所編的《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就收了不少當地華語中的閩南話詞語。例如：五腳基（騎樓）、薄餅（春捲）、娘惹（華人所生的混血女性）、巴仙（百分比）、大伯公（土地爺）、腳踏車（自行車）、三層肉（五花肉）。周清海（2002）編著的《新加坡華語詞彙與語法》一書也羅列了不少所吸收的閩南話構詞法和句法。例如：斤半（一斤半）、千五六（一千五六百）、尺六（一尺六寸）、大粒（好大一粒）、臉黑黑（黑黑的臉）、很興趣（很有興趣）、有想過（想過）、一間醫院（一家醫院）。方言成份比較容易進入通語是在境外的特殊條件下才是可能的。2010年在北京出版的《全球華語詞典》（李宇明 2010）對於海外華人為海外華語引進的漢語方言詞語已經有了很大記錄，值得參考和研究。

3. 南洋閩人的語言生活反映了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的品格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生活是文化品格的展示。華人（包括閩人、粵人和客家人）向東南亞移民的歷史以及移民社會的語言生活，是有深刻的文化意義的，很值得發掘。

縱觀世界移民史，有的民族或族群移向境外，把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都拋棄了，這是被迫為強者所同化，例如從非洲被賣往北美的奴隸。有的把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強加於人，例如歐洲的殖民者把法語帶到非洲，把西班牙語帶到南美洲，這是靠強權去同化別人。華人開闢海上絲路、向東南亞移民，走的卻是另一條道路：數百年間的陸續移民，繁衍了上千萬人，分佈在幾十個國家和地區，在陌生的海域上漂泊，在荒蕪的土地上墾殖，和原住民攜手、聯姻，同生死、共患難，打出一片嶄新的天地。在語言文化上，一方面固守自家的母語和民族文化，一方面又兼通當地語言、吸收異文化，使自己得以生存和發展。這就是中華民族“和而不同”的可貴品格。“和”就是和平、和氣、和善、和順、和協，最後達成了和諧；“不同”就是不等同、不混同、不苟同、不夥同、不雷同、不類同。對內保留自己的語言文化就是“不同”，對外採取雙語制、多語制，達到了“和”。天下萬物，不論是自然物或是社會現象，從內部結構、生成過程到外部環境，都是不同的，有不同就存在著對立或矛盾。而要在同一的空間共存，就必須經過時間的磨合去達到和諧，和諧也就是統一。《論語》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保持自己的個性並加以必要的調整以適應環境，為別人所理解和接受，這就是與人為善、和而不同。只要求別人來服從你、適應你，終究是不能達到和諧的。因為語言文字而產生的矛盾和紛爭，不是到現在還沒有止息嗎？可見，“不同”就是對立，“和”才是統一。“同而不和”可能是經過壓服的，也可能是被屈服的，總之都是經過矛盾和抗爭，並不能達到和諧。“和而不同”則是求同、認同、協同而達到和諧的過程，也是理解和完善的認識昇華的過程。

東南亞華人的“和而不同”是經歷過長時間的理解過程的，也經歷過多次“認同”的轉換。早期出洋時，只能靠族群、方言幫的認同，建立宗親會、同鄉會，互相幫助，共濟時艱。這是民國以前南洋華僑的“流寓時代”的狀況。立足於異邦之後的“華僑時代”，主要靠民族認同，和故鄉、祖國保持緊密聯繫，在外則組織同業公會、行業商會以協調動作，爭取合法權益，這是二戰結束前的狀況。二戰之後，殖民主義不存在了，南洋各地建立了民族國家，新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於是進入了“華人時代”，面臨著國家認同的新問題。從華僑時代到華人時代，民間有更加準確生動的通俗說法，這就是：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殖民主義者走了，被統治的民族獨立了，在著手建設新的國家的時候，起用民族語言，發揚民族文化，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東南亞各國的華人，數百年間已經繁衍為上千萬的群體，適應了當地的生活，也建立了驕人的家業，舉家回國是不現實的，在當地落籍成了正確的選擇。經過一番不安和波動，南洋華人完成了“國家認同”的轉變，做到了尊重當地的主體民族，繼續已有的互助合作的傳統，以主人翁的姿態，共同建設新的國家。這也是東南亞各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繁榮發展的重要條件。

印尼歸僑、暨南大學的楊啟光教授（2000）在他的《印尼華人的日常用語及其文化認同探析》一文中指出：“時至今日，印尼華人大都以雙語或多語為日常用語，單純只以漢語或其方言、西方語言或原住民語言為日常用語者逐漸減少，尤其是只持漢語方言的單語者所剩無幾。與此相應，在文化認同上，力圖單純地認同于中華文化、原住民文化或西方文化者也在急劇減少。越來越多的印尼人意識到，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印尼長期生存並繁衍至今，歷數劫難而又柳暗花明，是在求生圖存的社會實踐中不斷地相容了中華文化、原住民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要素，並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地建構著‘三合一’的印尼華人文化並作為認同對象的結果”。他對於印尼華人的語言文化的現狀和認同的分析是符合事實，也是符合歷史邏輯的，這在東南亞各國的華人中是很典型的現象，也是很合理的事實。應該說，這是華人和中華文化走出異域的數百年間所創造出來的可貴經驗。

讓我們為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的品格點贊，為這種浩大的包容性和靈活的適應性而點贊。

參考文獻

- Bodman, Nicholas Cleaveland (包擬古). 1955. *Spoken Amoy Hokkien*. Kuala Lumpur: Charles Genier & Son, Ltd.
- Chen, Jiarong (陳家榮). 1987. *Zhongwai Jiaotong Shi* 中外交通史 Xianggang: Xuejin Shudian 香港：學津書店。
- Chen, Xiaojin (陳曉錦). 2003. *Malaixiya de Sange Hanyu Fangyan* 馬來西亞的三個漢語方言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Gao, Ran (高然). 2000. Yinni Sumendala beibu de Minnan fangyan 印尼蘇門答臘北部的閩南方言 In Rulong Li (李如龍) (ed.), *Dongnanya Huaren Yuyan Yanjiu* 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 165–194. Beijing: Beijing Yuyan Wenhua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Goddard, Josiah. 1883.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2nd edn.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Li, Rulong (李如龍). 1997. *Fujian Fangyan* 福建方言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Li, Rulong (李如龍). 1998. Minnan fangyan yu Yinniyu de xianghu jieci 閩南方言與印尼語的相互借詞 In Rulong Li (李如龍) (ed.), *Fangyanxue Yingyong Yanjiu Wenji* 方言學應用研究文集, 131–175. Changsha: Hu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長沙: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Li, Rulong (李如龍). 2000a. Malaixiya Huaren de yuyan shenghuo ji qi lishi beijing 馬來西亞華人的語言生活及其歷史背景 In Rulong Li (李如龍) (ed.), *Dongnanya Huaren Yuyan Yanjiu* 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 1–15. Beijing: Beijing Yuyan Wenhua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Li, Rulong (李如龍). 2000b. *Hua Yi Tongyu yanjiu* 〈華夷通語〉研究 In Rulong Li (李如龍) (ed.), *Dongnanya Huaren Yuyan Yanjiu* 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 109–124. Beijing: Beijing Yuyan Wenhua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Li, Yuming (李宇明). 2010. *Quanqiu Huayu Cidian* 全球華語詞典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Li, Zhuqing (李竹青) & Rulong Li (李如龍). 1994. Chaozhou fangyan yuyin de yanbian 潮州方言語音的演變 In Liangshu Zheng (鄭良樹) & Chiyan Zheng (鄭赤琰) (eds.), *Chaozhouxue Guoji Yantaohui Lunwen Ji, shang ce* 潮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上冊), 181–194.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 Lin, Hengnan (林衡南). Guangxu 9 nian [1883]. *Hua Yi Tongyu, muke ben* 華夷通語 (木刻本) Xnjiapo: Gu You Xuan 新加坡: 古友軒.
- Lin, Zaifu (林再復). 1991. *Minnan Ren, zengding ban* 閩南人 (增訂版) Taibei: Sanmin Shuju 臺北: 三民書局.
- Wang, Huidi (汪惠迪) (ed.). 1999. *Xinjiapo Teyou Ciyu Cidian* 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 Xnjiapo: Xnjiapo Lianbang Chubanshe 新加坡聯邦出版社.
- Yang, Li (楊力) & Xiaodun Ye (葉小敦). 1993. *Dongnanya de Fujian Ren* 東南亞的福建人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Yang, Qiguang (楊啟光). 2000. Yindunixiya Huaren de richang yongyu ji qi wenhua rentong tanxi 印度尼西亞華人的日常用語及其文化認同探析 In Rulong Li (李如龍) (ed.), *Dongnanya Huaren Yuyan Yanjiu* 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 125–153. Beijing: Beijing Yuyan Wenhua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Zhou, Qinghai (周清海) (ed.). 2002. *Xinjiapo Huayu Cihui yu Yufa* 新加坡華語詞彙與語法 Xnjiapo: Lingzi Chuanmei Siren Youxian Gongsì 新加坡: 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Min Dialects

Rulong Li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Min dialects in the *Nanyang* is testimony to the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by ethnic Chinese. Several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Min varieties used in the *Nanyang*. The findings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speakers' loyalty to their mother tongue, but reflect the extensive interaction occurred in language contact as well. The language situation of Min speaking *Nanyang* Chinese is featured by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one of the values cherished in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Chinese culture, Min dialects, Min speaking *Nanyang* Chinese,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通訊地址：福建廈門思明區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lirulongchina@126.com

收稿日期：2017年5月12日

接受日期：2018年6月11日